



# 汉代镜铭整理研究的回顾、反思与展望\*

时嘉艺

**摘要:**通观对汉代镜铭的整理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宋至清为零散拾遗期;民国为初具雏形期;20世纪50年代以后,跨入专业集录与研究并重的时期。对汉代镜铭的研究又多集中在语言文字研究、文学研究和思想文化研究三个方面。然而,汉代镜铭的整理研究得失参半:一方面,汉代镜铭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不断拓展;另一方面,地方镜铭整理较多、集成式镜铭整理较少,文献研究较多、多学科交叉研究较少,思想内容研究较多、与文本生成相关的外部问题研究较少。因此,今后对汉代镜铭的整理研究工作要突出“全”和“精”,研究方法要趋向多元: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两相观照,注重域外文献带来的新鲜素材,兼收文献学、图像学等跨学科手法,进一步拓宽汉代镜铭的研究。

**关键词:**汉代镜铭;回顾反思;“全”“精”整理;综合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0)05-0103-10

铜镜是和甲骨、青铜器、简帛、石刻并列的文献载体。罗振玉在《古镜图录》序言中说:“刻画之精巧,文字之瑰奇,辞旨之温雅,一器而三善备焉者莫镜若也。”<sup>[1]</sup>对铜镜予以高度评价,其中“辞旨之温雅”即指镜铭部分。铜镜铭文萌芽于战国,兴盛于汉代,是两汉的标志性文本形态之一,全国又形成了长安、临淄、丹阳、洛阳等多个造镜中心,这些地区出土铜镜铭文内容所涉颇丰、形式富于变化,兼具可读性与装饰性,譬如洛阳就囊括了两汉时期流行的大部分镜种。以镜铭窥史,汉代的思想、文学等诸多方面将呈现得更为立体。对汉代镜铭的文献整理起于宋代宣和年间,距今已有900年历史,对其文本进行的研究也有近90年。可见,汉代镜铭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历时已久,问题当多,同时成果亦较丰硕。本文对汉代镜铭的整理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全面回顾,以总结其利弊得失,探寻更为科学的研究方法、确立新的研究起点和努力方

向,势在必行。

## 一、历史回顾

### (一)汉代镜铭的整理

据笔者统计,自北宋末年至清代,载录汉代镜铭的古籍有28部;民国时期的著述有23部;新中国成立后的图录著作多达119部,集中整理镜铭的论文有9篇。汉镜铭的整理进程在清代前尚属零散罗列,民国时期渐成系统,时至今日,整理成果已涵盖镜铭大部分种类,然依旧有待完善补充。

#### 1. 古籍对镜铭的著录

对镜铭的著录缘起于宋代金石学,自北宋至清代,出现了一批载录铜镜及铭文的著作<sup>①</sup>,然各书所收汉镜均不超过百面,且考释从简。最早载录镜铭的著作是北宋末年王黼的《宣和博古图》,该书属图录类著作,描绘图像、勾勒铭

收稿日期:2020-07-09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宋前出土文献及佚文献文学研究”(15ZDA1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时嘉艺,女,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文,根据镜背图像分为“八门”,即八种类型,著录汉镜68面<sup>②</sup>,此书虽在断代和铭文释读方面有所缺憾,但实为铜镜学伊始。元明时期,铜镜研究一度出现断层<sup>③</sup>。在清代乾嘉至道光年间,金石学再次复兴,收集镜铭的著作较宋代更多,图录类著作中有乾隆敕修的“西清四鉴”<sup>④</sup>。除官方修书外,民间亦多有图谱,钱坫的《浣花拜石轩镜铭集录》<sup>[2]</sup>(卷一、卷二录汉镜15面)图文兼具,是第一部专收铜镜的著作(所收汉镜均有铭文)。梁廷枏的《藤花亭镜谱》<sup>[3]</sup>不绘图像,只载录41则汉镜考释。陈介祺的《簠斋藏镜》<sup>⑤</sup>兼收有铭无铭镜,为清代私人藏镜之最。上述古籍均未脱金石学范畴,且铭文释读用功未深,研究亦未开展。

## 2. 民国时期对镜铭的整理

这一时期著作中所收铜镜在数量上远超前人,研究领域亦有扩充,学者着重对镜铭进行文字学方面的考察,考古类型学的方法也被首次引入。罗振玉的系列文章首次在文字学层面对镜铭展开整理研究,《汉两京以来镜铭集录》<sup>[4]1-36</sup>(录汉镜铭190余则)是民国时期专录镜铭的标志性著作,《镜话》<sup>[4]37-50</sup>对汉代镜铭文字中的通假、错别字、减笔字以及铭文字体的演变、各代铜镜的特征都进行了细致分析。刘体智的《小校经阁金文拓本》<sup>[5]</sup>载录汉镜600余面,数目达历代之最,然未脱前代研究范畴,仍只单纯摹图并附铭文。又有吴闿生集释《吉金文录》<sup>[6]</sup>(录镜铭44则,其中汉镜铭28则),指出前人断代错误,标明铭中通假、脱漏字及韵脚字在汉代的读音,认为部分汉镜铭“有楚辞遗意”“似乐府古歌”,首次将镜铭纳入文学研究视野。而能代表当时金石学框架内铜镜研究最高水准的,当属梁上椿的《岩窟藏镜》<sup>[7]</sup>,此书收录铜镜624面,其中有铭无铭汉镜132面,按照年代划分为四集,每集卷首有概说、分论,详细描述各类镜型的纹饰、尺寸。作者还对前人错误的判断给予订正。书中对铜镜的一些定名和断代延用至今,堪为新中国成立前铜镜图录的范本。

这些著录保留了很多珍贵的早期图像文字资料,亦可从中窥见前贤治学研究风貌,罗振玉、吴闿生等人的著作较前人更详尽细致,其成果具有启示性作用。梁上椿的著作是民国铜镜

学集大成之作,首次用照相技术拍摄铜镜,保留很多较清晰的图版。但和民国以前的古籍一样,这些著录均采用传世铜镜,失去了铜镜的出土时间和地点,对其发展脉络只能做出大致推测,更无法谈及地域特征。在图像、拓释文字方面,也存在一些误摹、误释,有待今人予以更正。早期研究停留于金石学、文字学层面,对镜铭中所包含的诸多文学、文化讯息尚未深入关注。

## 3. 新中国成立后对镜铭的集录

新中国成立初期,考古工作的规模仍然有限,20世纪50年代以后,田野考古才逐步发展,出土铜镜数量也显著增长,大量地下文物的出土丰富了铜镜资料库,各类集录著作随之涌现。考古发掘简报、报告中多有对铜镜的详介,例如《洛阳烧沟汉墓》<sup>[8]</sup>(1959年)收录有铭无铭铜镜118面,分为14型,分析每一型铜镜的相对年代,用专业的类型学方法为铜镜学搭建框架。而大部分考古报告虽可提供一手的真实资料,但其中对铜镜的记录比较零散,亟待研究者进行专门的汇总、整理。

在考古发掘的基础上,各省相继出版铜镜著录选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有20余省市出版铜镜图录<sup>⑥</sup>。2000年之前的图录由于技术所限,多为黑白图版,清晰度低,且图文分离,未对铜镜逐一作出详释。2000年后的图录更为精良,从文博角度著录铜镜形制,图文兼采,附考释铭文,各书的序文往往是点睛之笔,对铜镜的地域性特点作出了精当概括。如王仕伦、王牧主编的《浙江出土铜镜》<sup>[9]</sup>(2006年),作者在原序中介绍了浙江铜镜的分期特点,列举会稽、湖州地区独特的镜形,并附有历代镜铭选录。

一些私人收藏家亦出版铜镜图录,如王度、王纲怀等收藏家,致力于铜镜的收集研究工作。众多拍卖公司均设有铜镜专场,并刊发精致图册。但不同于考古报告和各地著录,私人收藏或拍卖展品很可能会混入个别伪镜,在使用资料的过程中要详加辨别。

上述列举的古籍、考古报告、图录为镜铭集录做好了先导性工作。20世纪90年代,台湾学者林素清重新对镜铭进行集录,他相继发表《两汉镜铭初探》(1993年)、《两汉镜铭汇编》<sup>⑦</sup>(1999

年,收录542则铭文),这些文章较之罗振玉的《汉两京以来镜铭集录》更加清晰。在《两汉镜铭汇编》一文中,林素清将铜镜类型及字体特征分为七期,列举各阶段常见铭文,分析书体特征,以铜镜展现两汉文字演变史。王士伦在《浙江出土铜镜·序言》(2006年)中附《历代镜铭选录》<sup>[9]45</sup>,录镜铭250则,其中汉镜铭138则。华东师范大学李新城博士论文《东汉铜镜铭文整理与研究》<sup>[10]</sup>(2006年)选取东汉及新莽时期有代表性的铭文1148则进行注释。邱龙升在硕士论文基础上完成《两汉镜铭文字研究》<sup>[11]</sup>(2012年),该书选取两汉完整有代表性的镜铭150则,并对铜镜的文字书写特征进行纲要式概述。鹏宇博士论文《两汉镜铭文字整理与考释》<sup>[12]</sup>(2013年)上编为镜铭辑录,统计两汉3242则镜铭,为当今镜铭整理中最多最全之作;论文下编为文字编,收703个字头,罗列镜铭字形。清华大学汉镜文化研究课题组所编《汉镜文化研究》<sup>[13]</sup>(2014年)择200面铜镜刊印图录,所选铜镜在纪年、纹饰或铭文上有突出特点。

另有鹏宇《宋代文献所见汉镜题铭辑校》<sup>[14]</sup>(2017年),将散见于宋代典籍中的汉镜铭文与图像重新辑录,并对原著进行点校、注释,订正误摹误释字形,为汉镜研究提供了文字学方面的扎实基础。该书亦将与古人所著铜镜相似出土铜镜随文附录,两相比观,颇有古人所见之镜再现于世之感。

#### 4. 海外对镜铭的整理与研究

在20世纪20年代,国外学者对汉镜的研究也逐渐展开,尤以日本学者的研究最为显著。江户时代,狩谷掖斋以考据学研究方法收集汉镜及拓本,松崎谦堂撰书载录狩谷藏镜铭文<sup>[15]</sup>,但并未予以考释。明治到大正时代,由于平壤铜镜大量出土,又及罗振玉前往京都,日本铜镜学研究迎来契机,大村西崖和山田孝雄将铜镜纳入美术史和文学研究的视野,富冈谦藏与罗振玉交往甚好,他的研究以考古学为基础,其著作《古鏡の研究》<sup>[16]</sup>对铜镜的成分、纹样、铭文均有论述。此后,梅原末治、驹井和爱、樋口隆康、三木太郎<sup>®</sup>等学者也致力于铜镜的研究,樋口隆康《中国古鏡銘文の類別的研究》将镜铭划分21种模板,并归纳出7种常见镜铭与镜图的搭配类

型<sup>[17]</sup>,这种研究方式使分散的镜铭得以条理化、类型化。林裕己利用计算机制作镜铭文本数据库,所收镜铭超过万件。

近年日本铜镜学领域,以冈村秀典的研究最为卓著,他着眼于长期被忽视的镜铭领域,指导开展“铜镜研究班”释读镜铭,先后发表《前汉镜铭集释》《后汉镜铭集释》和《三国西晋镜铭集释》<sup>®</sup>,选取西汉具有典型性的铭文,逐一释读,并注意到文字出处、押韵及语序排列等问题。冈村秀典《汉镜分期研究》一文辑录647则汉代镜铭,61则纪年镜铭<sup>[13]46-110</sup>,在对汉镜图文分析的基础上,明确各镜种的分期,冈村秀典的创见在于,拓宽了前人以图像、文字为基础的铜镜分期法则,把镜铭也作为分期的重要元素,建立起完整的汉镜编年体系。孔祥星对冈村秀典的研究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其文本细读和对铭文分期的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另有复旦大学孙赛雄的硕士论文对日籍中汉魏铜镜铭文进行整理,录镜铭1187则,涉及载有汉镜的日籍92部,对中国补充汉代镜铭研究起到重要作用<sup>[18]</sup>。

欧美的铜镜学研究较之日本相对寥寥,1934年瑞典学者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在罗振玉《汉两京以来镜铭集录》的基础上集成257种铭文,对镜铭的押韵、假借等现象,作出语言学角度的释读<sup>[19]</sup>。又有容庚拓哈佛燕京学社藏有铭无铭镜58面<sup>[20]</sup>,美国传教士福开森编著《历代著录吉金目》<sup>[21]</sup>,采录传世汉镜铭文600条左右。近年虽有美国安思远等收藏家的铜镜在佳士得拍卖中获得高价,但就整体而言,对铜镜的研究较为淡然。

#### (二) 汉代镜铭的研究

以丰富的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物为基础,今人对中国古代铜镜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汉镜研究的勃兴是在1960年后,据不完全统计,学术界共出版关于汉代镜铭研究的著作30余部,刊发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中著作多为综合类型,不仅涵盖汉镜的图像、纹饰、铭文,还涉及制镜工艺等多个方面。如孔祥星、刘一曼主编的《中国古代铜镜》<sup>[22]</sup>(1984年),兼具专业性与普及性,是第一部对汉镜及铭文进行全面详实研究的著作,至今仍然无出其右者。只是由于印刷质量有限,图版尚欠清晰。此后铜镜学领域著

作,多沿袭孔祥星的研究方法。清华大学汉镜文化研究课题组主编的《汉镜文化研究》<sup>[13]</sup>(2014年)由中日学者共同参与,汇集多篇研究镜铭领域最前沿的论文。但是,就汉代铜镜铭文文本的研究而言,最见学术成就的还是单篇学术论文,论文从语言文字(34篇)、文学(24篇)、思想文化(58篇)等角度对汉镜铭文进行了全方位、开创性的研究。

### 1. 语言文字研究

第一,考订释读。除整理集录外,镜铭研究的另一个难点在于释读,前者因为数量之大,后者因为辨识之艰。尽管与其他青铜铭文相比,镜铭用字较浅易、多重复,但因年代久远,部分镜铭锈蚀不清,加之书体变化、刻字者增删修改等原因,使辨识工作多有不易。

当镜铭出现可与传世文献互证的例子,会引起学者的集中讨论,例如围绕一面东汉神兽纹镜的《诗经·硕人》铭文,就有罗福颐、徐鉴梅、胡平生、李学勤、陆锡兴、周远斌等多位学者进行隶定、考释<sup>①</sup>。

面对一些含义驳杂模糊的字句,则会引起专家释义之争。例如对镜铭中“青羊”“三羊”“黄羊”作何解释历来存有争议<sup>②</sup>。王仲殊考证东汉盘龙镜、神兽镜背铭文“青羊作镜”中的“青羊”为吴郡吴县的镜工之名,同时推断“三羊”和“黄羊”也是作镜工匠家族的名号。刘航宁则持不同意见,以洛阳出土东汉“青羊”铭龙虎镜为例,打破前文认为“青羊”铭盘龙镜、神兽镜为吴镜的观点,指出“青羊”铭文镜制作中心为洛阳。认为“三羊”指铜、锡、铅三种祥瑞金属,“青羊”为青铜之义,而对于“黄羊”的解释较为模糊,应也是关于铜镜的吉祥语。总之,“三羊”“青羊”“黄羊”均不是铸镜工匠的名号。李振华又有不同见解,他在文中介绍了四川洪雅县文管所收藏的一面四印铭文神兽镜,镜背有“汉家长宁,黄羊作镜,公卿服者,富贵番昌”,认为“黄羊作镜”中的“黄羊”即战国时期晋大夫祁黄羊,以秉公办事著称。冈村秀典的部分观点与刘航宇相近,认为“青羊”也可写作“青祥”,是一种吉语,指代优质金属,又说镜匠们在“尚方”中成立了雅号为“青盖”的组织,后来“青盖”渐渐独立,分别代称为“青羊”“黄羊”“黄盖”的作

坊。刘航宁与冈村秀典之说较为可靠,“三羊”“青羊”之义,最初为附加了祥瑞意义的金属,后发展为制镜品牌和组织的代称。这种演变不可能,只是这种释义未见于其他文献,唯在镜铭中出现尚属孤证,还需更多辅助文献方能坐实说法。

第二,文字汇编。在镜铭文字资料汇编方面,复旦大学鹏宇博士论文《两汉镜铭文字整理与考释》<sup>[12]</sup>上编选取3000余则镜铭,逐一作出释文,详列出处。下编也以《说文解字》为序,收703字头编写文字编。目前虽有字书类著作收录镜铭,但还未有专门的镜铭类文字编专著出版。

第三,用字、书体。文字学学者将镜铭与其他出土文献进行比对,将其纳入汉代文字史的整体框架中去,这些工作有利于总结汉代文字的发展特性。王士伦首将汉魏六朝(主要为东汉)镜铭的省简字和异体字列表说明,而文中“镜铭的减笔字、流行于南北朝,两汉偶有之”<sup>[23]</sup>的观点并不符合历史实际,事实是减笔字两汉已流行。邱龙升《两汉镜铭文字研究》<sup>[11]</sup>对两汉镜铭的用字及演变进行系统性总结,是目前汉镜铭文字学领域中最为专业、全面的成果。孙晖《西汉镜铭书体与简帛书比较研究》对比简帛与铜镜铭文,发现隶书的发展在不同介质上呈现不平衡的现象,即在简帛中较为激进,西汉中期已经出现成熟今隶(分书),在铜镜中比较保守,至西汉晚期才出现少量古隶,东汉早期才出现有波磔的分书<sup>[13]408-420</sup>。其打破异质史料界限,结合书写材料物质性的研究方法令人耳目一新。

### 2. 文学研究

明冯惟讷《古诗纪》把汉镜铭文作为诗歌收入其中,承认了该类铭文书具有独立的文学意义。当代学者对镜铭研究多着眼于文体方面,尤为重视镜铭与七言诗歌的生成关系。关于七言诗的生成历程,东汉张衡的《四愁诗》被认为是文人七言诗之最早雏形,而早在西汉末年镜铭中就存在大量七言体,且新莽时期多有“黍(七)言之纪从镜始”铭文,故而学者就此展开论述,认为七言镜铭是研究诗歌体式流变的重要一环。李立、胡淑芳、潘海东、林训涛等均指出

汉七言镜铭是民间歌谣向文人创作过渡的产物,是完整的七言体诗歌,汉七言镜铭诗形成时间可上溯至西汉晚期<sup>[23]</sup>。钱志熙亦论及镜铭五言体缺失的原因,认为汉初镜铭诗形源于四言体和楚歌体,不具备五言形成的条件<sup>[24]</sup>。因多数学者把镜铭定义为俗文学,故除文体研究之外,对其文学性研究相对较少,陈直指出汉镜铭文是文学史上的珍贵素材<sup>[25]</sup>,引发一些学者对其文学价值的关注。汪春泓以对昭明镜和精白镜铭的解读为缘起<sup>[26]</sup>,阐述秦汉时期士人的“固精意识”及这种意识在诗学领域的影响。钱志熙阐释镜铭中不仅有内容丰富的社会意识,更存在非理性的生命意识,镜铭是认识汉代社会在我国古代人类意识发展史所处阶段的重要依据;就镜铭的文学价值而言,它具有独立的韵文创作系统,与汉诗、赋、谣谚等韵文体关联密切,对建构汉代诗歌史大有裨益。张炳生的《汉镜铭文与汉乐府——兼说语体与韵体》将汉镜铭与汉乐府对读,认为许多镜铭脱胎于乐府,两者既联系密切,又各具艺术特质<sup>[13]349-356</sup>。王纲怀、游战洪《西汉镜铭相思文化概说》一文分析了相思镜铭产生的社会背景,并将汉乐府中的游子思妇诗与之相参照<sup>[13]437-446</sup>。

### 3. 思想文化研究

较诗赋而言,汉镜铭文虽然简易,但其思想内容涵盖了汉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既有反映高官封侯、富贵享乐的祝福之语,也有反映教育制度和选官制度的内容,更多的是对神仙的崇拜、对长生的渴求……种种反映现实、期盼未来的内容都是此前时代从未有过的,是汉代人观念的再现。因此,对汉镜铭文思想文化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诸多学者针对某一项镜铭内容分类解读。

第一,民俗类铭文。林素清的《从两汉镜铭看汉人的祝愿语》认为镜铭中的祝愿语反映当时的社会风貌<sup>[13]349-356</sup>;张炳生在《两汉镜铭广告文化》中对镜铭所体现的商业用语进行解读<sup>[13]482-488</sup>。

第二,礼乐文明类铭文。王纲怀、张炳生《从东汉伯牙镜看汉代礼乐文化》一文认为镜上频现的伯牙形象有奏乐娱神功能,是汉朝崇尚礼乐的反映<sup>[13]540-546</sup>。孙克让从一则东汉镜铭

“郡举孝廉州博士,少不努力老大悔”入手,他的《从镜铭看汉代选官制度》结合几面铜镜实例,对汉代选官制度进行分析<sup>[13]148-156</sup>。

第三,神仙思想类铭文。汉镜图铭众多主题之中,以神仙思想最为突出,以往学界研究主要集中在众仙图像的释义、演变及时代动因,着重关注西王母形象,并把神仙图像与汉代思想史、宗教史结合研究。张金仪《汉镜所反映的神话传说与神仙思想》<sup>[27]</sup>是该类研究的发轫之作,该书对神仙群像的追溯考证颇具启发性,但因出版时间较早,该书所举出土材料尚不全面。杨玉彬《汉镜神仙思想研究》对张金仪著作进行了补充,梳理不同时期汉镜神仙思想的演变特征及时代动因<sup>[13]191-214</sup>。关于西王母对偶神东王公出现的时间,一直是学界的关注焦点,随着新的汉镜考古材料出现,对其出现时间的认识不断提前,以往学界认为东汉和帝刘肇永元三年(91年)是汉镜中东王公出现的最早时间,而刘子亮、杨君、徐长青依据海昏侯衣镜上的“东王公西王母图”和《衣镜赋》将东王公出现的时间由东汉早期提前到了公元前1世纪前叶,并证明“阳仙”东王公、“阴仙”西王母的对应组合模式形象在西汉宣帝已经成型<sup>[28]</sup>。

第四,宗教类铭文。提及铜镜铭文及纹饰中的众仙形象,道教是与之密切相关的话题。管维良以神兽镜铭文为研究对象,认为神兽镜是道教发展昌盛的产物,他将神兽镜纹饰与道教神灵相对应,并广引道教文献对镜铭考释<sup>[29]</sup>,发掘出前人未识之义。立足于宗教视角,会对镜铭有不同的阐释,巫鸿通过考察四川地区的五斗米道传教的过程,认为铭文中的“其师命长”的“师”应是五斗米道的传教人员,或至少是此镜的所有者和使用者<sup>[30]485-508</sup>。苏奎则认为铭文中的“师”应该是铸镜的“镜师”,并非蜀地“五斗米道”的神职人员<sup>[31]</sup>。当以苏奎之说更为可靠。

## 二、得失反思

通过对上述资料的追溯整理,可以条缕分明地把握学术史的发展进程,窥见汉代镜铭整理、研究的历经阶段。

宋至清为预备阶段。宋代开启金石学领域的著录,将铜镜与其他青铜器等量齐观,清代研究继承了宋代一些特点,在铜镜著录的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提升,不仅官方著录铜镜,民间亦有独立的著作,而古代铜镜著录虽多,却始终没有超越金石学范畴,仅对传世铜镜进行片羽拾零,真正的整理并未开展。

民国时期进入起步阶段。照相技术为图录刊刻提供了更好条件,铜镜研究也逐步开展,梁上椿考古学的方法,罗振玉文字学视角的切入,将铜镜及镜铭的整理研究带入正轨。这一时期日本研究成果较多,而国内相对较少。然前两个阶段的铜镜多涉传世品,难以准确分析铜镜的发展脉络和地域特点。

20世纪50年代以后,铜镜学跨入整理与研究并重的专业化时代。日本学者对镜铭关注较早,樋口隆康开镜铭类型学的研究先河,然由于当时国际学术交流的限制,其成果在近年才被国内吸收。国内研究进程也在持续推进,田野考古的发掘成果、各文博单位出版的图录著作,均建立在扎实的考古学基础上,为镜铭的整理提供便利。孔祥星、王士伦、林素清、周世荣等在汉镜分期和镜铭集录方面成果显著。陈直、裘锡圭、李学勤、李零等为镜铭字体辨识打下根基。部分镜铭文义虽一目了然,但对镜铭中生涩词汇的解读仍是难点,如“黄羊”“青盖”铭的释义,冈村秀典的看法在逻辑上虽能成立,然仍需更多出土文献对其佐证。20世纪80年代,王仲殊发表一系列两汉三国镜流通史方面的文章,理清各省及中日之间的铜镜流通轨迹,令人耳目一新,如他分析了浙江、江苏、安徽、湖北的多面纪年铭神兽镜,结合铭文进行考察,认为它们均属“吴镜”<sup>[32]</sup>。文章虽涉三国镜居多,其研究方法却可被汉镜研究所借鉴。

近十几年来,拍摄、扫描、铜板彩印等技术对铜镜的研究发挥关键作用,更多著作减少了辨识错讹率,还原了文物实貌。李新城、邱龙升、鹏宇、孙赛雄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持续推动镜铭整理、注释及文字汇编工作,整理工作沿双线迈进:一是整理古籍中的镜铭。目前仅有鹏宇整理宋代典籍中所见镜铭,明清的著作还有待整理。二是集录传世及出土的镜铭。鹏宇

在博士论文中集3000余则镜铭,可谓涵盖总类型的十之八九,冈村秀典集录600余则镜铭,对镜铭类型有所补充。研究的路径也更为开阔,学界逐渐关注镜铭的文体学研究;汪春泓、钱志熙等学者从文学角度树立镜铭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张宏林、王纲怀等专家发掘镜铭深处的思想意蕴,镜铭不仅限于“证经补史”之用,较史书而言,反而更为贴近历史原貌。

追溯汉代镜铭整理研究的历史,其中得失为我们提供了可贵经验:

所“得”之处有二:一是研究对象不断扩展。自宋至民国,所有著录均为传世铜镜。新中国成立以后,出土铜镜数量增长,海外流失文物复现,为研究提供了更多优良的样本。二是研究方法持续扩充。宋代以来的金石学传统,至民国时期转向文字学、考古类型学领域;新中国成立以后,语言学、思想文化领域的研究不断增多,大批学者付出了艰辛努力,诞生了许多优秀的论文著作,让镜铭研究更具生命力。

所“失”之处有三:一是各地方镜铭整理较多,集成式镜铭整理较少。未来的镜铭集录工作可在鹏宇、冈村秀典等学者的基础上继续完善,即做到竭泽而渔搜集、精挑细择分类。还需对清代典籍著录重新整理,对各地黑白图录重新校录,汇总散失于海外的铜镜尤其是有铭铜镜。二是文献研究较多,多学科交叉研究较少。目前已有的研究主要包括:释读铜镜铭文;对镜铭进行书体研究;探究其文学、思想、宗教方面的价值,其中以文字考释和思想文化领域最多,而文学研究和域外交流研究较少,所涉领域有待拓宽。三是就铭文研究本身而言,思想内容研究较多,与文本生成相关的外部问题研究较少。除镜铭文本内容外,还有更多关于镜铭的衍生问题。如镜铭作者的转换对镜铭内容起到干预作用,西汉时期的铜镜主要限于上层贵族使用,生产者属于“尚方”机构,而在汉章帝时期出现手工业重心从官方到民间的重大转移,镜铭内容更加丰富,各则镜铭包含了作者富有创造性和艺术性的表现方式,镜师如何进行创作,又是如何对已有作品进行二次重构,也是值得研究的方面。

目前,镜铭整理、研究的基本框架已经搭

建,但进展步伐较为缓慢。在整理方面,有一些已完成却未尽人意的的工作仍需进行;在研究方面,以考古学研究为基石,兼顾多个学科的研究体系还要继续完善。通过回顾反思,可见研究中仍有很多可突破之处,以俟智者作更深入的研究。

### 三、前景展望

孔祥星在《创新是学术研究的本质——述评近几年汉镜铭文研究》<sup>[33]</sup>中指出,在铜镜研究方面,年代学、类型学最为突出,铜镜纹饰受到学界的特别重视,铜镜技术研究也是一大亮点,而铜镜铭文的研究是最薄弱的环节。通过回顾反思汉镜铭文研究历程,以下五个方面当是未来研究的着力方向:

#### (一)广博与精约兼顾

就文献整理而言,“广博”与“精约”同样重要。广博指集录之全。在大量出土、传世资料的基础上,做好基础集录、整理、注释、文字汇编工作仍是未来工作的重点。在镜铭集录方面,虽已有李新城、邱龙升、鹏宇、冈村秀典的集录,却仍有散落于各地的镜铭需要补充。国内目前未有独立且全面的两汉镜铭集录著作出版,这需要学者从古籍中搜集,从各地考古报告、铜镜图集中汇总,亲赴各地文博单位和考古实地进行调研,汇编出汉代镜铭集成。整理注释方面,有日本冈村秀典的《前汉镜铭集释》珠玉在前,其选取西汉具有典型性的122则铭文,逐个进行释读(包括出处、押韵、逐字解释、分析文义、罗列与此镜铭排列顺序和某些字词不同的其他镜铭)。其用功之深,为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范本,国内学者也需充分利用大量出土铜镜资源,对镜铭精校精释。文字汇编方面,目前仅有张丹硕士论文<sup>[34]</sup>、鹏宇博士论文曾编选独立的镜铭文字编<sup>[12]</sup>,还未有镜铭类文字编专著。因此,需要研究者具备扎实的素养和广博的学识,在现有成果之上出版更为详尽的铜镜铭文集成、集释、文字编等著作,完成基础性工作。

在集录的过程中,很多成果的吸收和转化并不及时,为研究带来不少障碍。让文献数据库发挥必要作用,也是未来铜镜研究工作中的

一个重点。“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汉代墓葬文化数据库设有铜镜专区,收录各类型铜镜高清图版,并附形制铭文简介,但对于出土地、馆藏、铜镜文化等方面则无更多讯息介绍。故可重新建立镜铭集录、文字汇编数据库。

精约指择取之精。镜铭虽数众散乱,但镜铭的模板类型是有限的,樋口隆康曾总结21种镜铭类型。伴随文物不断出土,镜铭类型还有很大的补充空间。在选取镜铭之时,纪年镜铭亦是值得关注的焦点,这类镜铭是记录史实、确立墓葬年代的关键之匙。总之,化繁为简,才能从大量的镜铭文献中发现要害。孔祥星曾指出,避免材料的碎片化,这样才可能总结出有规律性的东西<sup>[35]</sup>。把碎片化的信息系统整合,把中国传统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示人以治学门径的功能与数字化古籍数据库穷尽式的检索能力结合,学者方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进行研究。

#### (二)普遍性与地域性并重

整理还应注重文献的地域化特征。各地出版铜镜图录虽数量较多,质量却参差不齐,亟待重新整理。整理工作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2000年以前的图录多为黑白图版,无法看清铜镜的花纹、铭文细节,缺少对镜体信息的说明,还存在不少句读、摹字方面的错误,需重新整理、印刷;二、各省整理本的地域性特点仍不够突出,因铜镜在全国范围内流动,故各地出土镜铭内容看似趋同,多共性而少个性,对比之后方可发现,伴随造镜中心由中原向江浙转移,各地镜铭也颇具自身特点,例如“吾作明镜”文铜镜在浙江、湖北等地大量出土。各省图录虽重视异地镜型的区分,却常忽略镜铭的地域差别。对于地方文博考古单位出版著作应注意“联系性、概率性”,即注意与出土铜镜的载体(如墓葬等)相联系,总结出土数量呈现的概率性。此外,更需注重各地镜铭的“特色性”,发挥其独特价值。

#### (三)国内与域外文物并收

域外文献的整理也同样重要。目前,对域外铜镜流传的研究集中在两处:一是中日铜镜文化交流。王仲殊及冈村秀典等日本学者已做出卓越贡献,然可深入之处还有很多。日本出

土汉式镜数量众多,据冈村秀典、孙赛雄的镜铭集录来看,一些铭文是国内铜镜所没有的,这部分文献值得学者再去收集、比较。二是丝路之上的铜镜交流。经陇西高原、河西走廊和今新疆地区,进而至中亚、西亚,丝绸之路沿线众多墓葬均有汉代铜镜出土。通过贡赐、贸易、移民等方式,中原汉式镜传入西域,汉文化对西域文化发生了作用,同时,汉式镜也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而产生改变,如吴郡(今浙江杭州)和会稽郡(今浙江绍兴)出土镜铭中包含“天禄”“辟邪”“师(狮)子”“奇守(奇兽)”等词汇,是对西域奇兽的再现。以往学者研究常聚焦于墓葬布置、镜背图像,铭文所受的外来影响还有可挖掘的空间。此外,仍有众多铜镜散失于世界各地:亚洲、北美洲、欧洲和大洋洲的许多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也藏有大量中国古代铜镜。据苏强《海外藏中国古代铜镜概述》<sup>[36]</sup>统计,日本、美国及欧洲各国收藏中国古代铜镜的博物馆近40余所,这些馆藏铜镜镜型多精致,镜铭也有待汇总、整理。

#### (四)出土与传世文献齐观

传统铜镜学研究通常重图像而轻铭文,把镜铭视为俗文学的一种,将它和作为“雅文学”的传世诗歌对立起来,很少正视镜铭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实则,出土镜铭不仅是传世文献的补充材料,更有传世文献未及之处。陈直有言:“(镜铭)为优秀古朴的作品,这些宝贵的材料,在《汉书》里是看不出来的。”<sup>[25]</sup>研究者需摆脱抑此扬彼的思维方式,两相参照,方能更好还原汉代的思想、文学、宗教等历史实情。如在史学研究方面,新莽时期的镜铭多涉时政类,可从中一窥王莽新政推行的实况。在文学研究方面,汉代早期镜铭与瓦当等实用器具上的吉祥语颇为相似,晚期则受到乐府诗和赋体的影响,文风转变,更有近乎文人创作的“昭明文”“精白文”“姚皎光文”等。故而,汉镜铭文是两汉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环,其用词简洁、通篇对偶、又尚通俗,是研究两汉文学的重要素材。镜铭的文体研究,依然有可开拓的空间,前人研究的侧重点往往在七言镜铭与七言诗的生成关系上,探讨七言诗的来源究竟是七言镜铭、赋体文学抑或是其他。但如果把视角转入镜铭体系内

部的形式变动,从海昏侯《衣镜赋》的句式分析,就会发现《衣镜赋》每句为八言,将其“兮”字去掉,每句呈现出“四+三”句型,可被视为早期七言镜铭的起源之一。笔者曾总结过七言镜铭的几种生成模式,分别为“三+(兮)+三”型、“四+三”型及“六言+(兮)”型,如此便可体察到七言镜铭和七言诗有共同的赋体源头,而镜铭在生成之后,与赋体虽偶有关联,但自有其书写模式及发展脉络。

#### (五)文献学与图像学结合

“汉人作镜,雕镂、文字、铜质三者均精”<sup>[4]47</sup>,罗振玉曾在《镜话》中概括汉镜三个特点,这也成为今人研究的三个主攻方向。孔祥星在提及我国镜鉴学工作时也指出,除著录铜镜外,还应对铜镜开展三个方面的研究:一是对铜镜形制和纹饰的研究,明确各个历史时期铜镜的类型、演变序列和纹饰寓意;二是对铜镜铭文的研究,考订字句,明确意义;三是对铜镜铸造工艺的研究<sup>[22]1-2</sup>。以上三点内容,可相互贯通,研究铜镜的“文图学”或“器物学”,是今后汉镜铭研究的思路。既往研究中,只有樋口隆康、邓林<sup>[37]</sup>在论文中对此涉及,更多时候对三者的研究往往是分离、脱钩的。图像与铭文实为一个整体,两者可相互生发、诠释。

又及,汉镜与汉绘画、画像石、画像砖、雕塑也有很多共同意象群,如神仙、瑞兽、民间游艺等。这些题材在不同媒介上反复出现,合而观之,可发现其中诸多共鸣之处,各学科彼此配合,达成“铭”“诗”“图”“史”的互证,方能使铜镜之学日益完满。

#### 注释

- ①据李新城《东汉铜镜铭文整理与研究》对铜镜古籍的分类,大致可分为6类:1.图像和铭文并重的图录类;2.只著录图像的图像类;3.只著录铭文的款识类;4.集录镜铭的集录类;5.收录铭文字形的字书类;6.文人笔记、札记、诗文集中亦有所见。李新城:《东汉铜镜铭文整理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第4页。  
②王黼著录,牧东整理:《重修宣和博古图》,广陵书社2010年版,第554-600页。卷二八、卷二九、卷三十著录“八门”,录汉唐古镜113面,其中汉镜68面,但如海兽鉴、海马蒲萄鉴应为唐镜,被误录为汉镜,至清代古籍中多出现此类问题。③元、明没有专门著录和研究铜

镜铭文的著作,仅在一些文人笔记和诗词汇编类中可见,如冯惟讷的《古诗纪》等。<sup>④</sup>梁诗正等编纂《西清古鉴》卷三十九录汉镜21面、《宁寿鉴古》卷十五录汉镜40面。王杰等编纂《西清续鉴甲编》卷十九录汉镜46面、《西清续鉴乙编》卷十九录汉镜27面。<sup>⑤</sup>陈介祺:《簠斋藏镜》,同治四年(1865年)抱残守缺斋托高邮宣哲编排影印。另有辛冠洁在嘉德拍卖会上拍得陈介祺藏镜一书,与前者分属不同拓本,录汉镜148面,辛冠洁将嘉德本整理出版为《陈介祺藏镜》,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sup>⑥</sup>如《陕西省出土铜镜》(1959年)、《湖南出土铜镜图录》(1960年)、《四川省出土铜镜》(1960年)、《阿城县出土铜镜》(1974年)、《上海博物馆藏青铜镜》(1987年)、《铜镜图案——湖南出土历代铜镜》(1987年)、《洛阳出土铜镜》(1988年)、《吉林出土铜镜》(1990年)、《鄂州铜镜》(2002年)、《广西铜镜》(2004年)、《浙江出土铜镜》(2006年)、《六安出土铜镜》(2008年)、《固原铜镜》(2008年)、《铜镜·西安文物精华》(2008年)、《鉴耀齐鲁》(2009年)、《(江苏)仪征馆藏铜镜》(2010年)、《淮南市博物馆藏镜》(2011年)、《汉广陵国铜镜》(2013年)、《山东临淄战国汉代墓葬与出土铜镜研究》(2017年)等。<sup>⑦</sup>参见林素清:《两汉镜铭初探》,《“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语言文字编·文字卷》,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009页。林素清《两汉镜铭汇编》,《古文字论文集》,台湾国立编译馆1999年版,第244-286页。<sup>⑧</sup>参见梅原末治:《欧米搜储支那古铜精华·镜鑿部(一)》《欧米搜储支那古铜精华·镜鑿部(二)》,山中商會,1933年。《漢以前の古鏡の研究》,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1936年。《漢三國六朝紀年鏡圖說》,桑名文星堂,1943年。《紹興古鏡聚英》,桑名文星堂,1939年。駒井和愛:《中國古鏡研究》,岩波書店,1953年。樋口隆康:《古鏡》,新潮社,1985年。《鏡鑿》,泉屋博古館,1990年。三木太郎:《古鏡銘文集成·日本古代史研究要覽》,新人物往來社,1998年。<sup>⑨</sup>参见岡村秀典:《前漢鏡銘集釋》,《東方學報》,2009年,第139-209页。《後漢鏡銘集釋》,《東方學報》,2011年,第201-289页。《三國西晉鏡銘集釋》,《東方學報》,2011年,第291-333页。<sup>⑩</sup>参见罗福颐:《汉鲁诗镜考释》,《文物》,1980年6期,第80页。徐鉴梅:《东汉诗经铭文镜》,《江汉考古》,1985年第4期,第77页录“汉镜诗”摹本。胡平生:《阜阳汉简〈诗经〉异文初探》,见《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6-89页。李学勤:《论〈硕人〉铭神兽镜》,《文史》(第十三辑),1988年,第47页。陆锡兴:《诗经异文研究·〈硕人〉镜的考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页。周远斌:《汉镜〈硕人〉铭文校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第1期,第13-15页。<sup>⑪</sup>王仲殊:《“青羊”为吴郡镜工考——再论东汉、三国、西晋时期吴郡所产的铜

镜》,《考古》,1986年第7期,第639-646页。刘航宁:《三羊、青羊、黄羊镜铭新考》,《中原文物》,1995年第2期,第83-91页。李振华:《“汉家长宁”铜镜考》,《四川文物》,1995年第10期,第23-27页。冈村秀典:《汉镜分期研究》,清华大学汉镜文化研究课题组《汉镜文化研究》,第46-110页。<sup>⑫</sup>参见李立:《汉代七言体铜镜铭文文体学意义初探》,《学术交流》,2002年第6期,第123-127页。胡淑芳:《汉代铜镜铭文中的七言诗》,《湖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7期,第481-484页。海东、林训涛:《汉镜铭文:完整七言诗成于西汉的确证》,《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10期,第111-114页。

#### 参考文献

- [1] 罗振玉.古镜图录[M].上虞罗氏影印本,1916(民国五年).
- [2] 钱坫.浣花拜石轩镜铭集录[M].陈乃乾《百一庐金石丛书》本,1921.
- [3] 梁廷枏.藤花亭镜谱[M].刻本,1845(清道光二十五年).
- [4] 罗振玉.汉两京以来镜铭集录:外十四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 [5] 刘体智.小校经阁金石拓本[M].小校经阁印本,1935(民国二十四年).
- [6] 吴闿生.吉金文录[M].北京:中华书局,1963.
- [7] 梁上椿.岩窟藏镜[M].上海:大业印刷局,1940.
- [8]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烧沟汉墓[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 [9] 王仕伦,王牧.浙江出土铜镜:增订本[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 [10] 李新城.东汉铜镜铭文整理与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
- [11] 邱龙升.两汉镜铭文字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 [12] 鹏宇.两汉镜铭文字整理与考释[D].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3.
- [13] 清华大学汉镜文化研究课题组.汉镜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 [14] 鹏宇.宋代文献所见汉镜题铭辑校[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 [15] 松崎谦堂.谦堂日曆[M].東京:平凡社,1970.
- [16] 富岡謙藏.古鏡の研究[M].東京:丸善株式會社,1920.
- [17] 樋口隆康.中國古鏡銘文の類別的研究[M].東方學(第七輯),1953.
- [18] 孙赛雄.日籍中的汉魏铭文镜汇编[D].复旦大学硕士论文,2014.
- [19] Bernhard Karlgren. Early Chinese Mirror Inscriptions [J].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 Antiquities, 1934(6): 7-79.
- [20] 容庚.古镜景[M].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影印本,1935(民国二十四年).
- [21] 福开森.历代著录吉金目[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9.
- [22] 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 [23] 王士伦.汉六朝镜铭初探[J].考古通讯,1958(9): 83-89.
- [24] 钱志熙.两汉镜铭文本整理与文学分析[J].中华文史论丛,2009(1): 133-164.
- [25] 陈直.汉镜铭文学上潜在的遗产[J].文史哲,1957(5): 60-62.
- [26] 汪春泓.从铜镜铭文蠡测汉代诗学[J].文学遗产,2004(3): 20-34.
- [27] 张金仪.汉镜所反映的神话传说与神仙思想[M].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81.
- [28] 刘子亮,杨君,徐长青.汉代东王公传说与图像新探:以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孔子衣镜”为线索[J].文物,2018(11): 81-86.
- [29] 管维良.汉魏六朝铜镜中神兽图像及有关铭文考释[J].江汉考古,1983(10): 85-93.
- [30] 巫鸿著,郑岩译.地域考古与对“五斗米道”美术传统的重构[M]//礼仪中的美术:下卷.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 [31] 苏奎.铜镜铭文“其师命长”的考察[J].考古,2009(3): 64-72.
- [32] 王仲殊.建安纪年铭神兽镜综论[J].考古,1988(4): 348-357.
- [33] 孔祥星.创新是学术研究的本质:述评近几年汉镜铭文研究[N].中国文物报,2012-06-20(5).
- [34] 张丹.汉代铜镜铭文研究概况及文字编[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 [35] 孔祥星.拓宽体裁、景象盈目:评《鉴若长河:中国古代铜镜的微观世界》[N].中国文物报,2018-01-23(6).
- [36] 苏强.海外藏中国古代铜镜概述[J].收藏,2013(9): 113-129.
- [37] 邓林.汉代铭文镜研究[D].上海大学博士论文,2017.

## The Review, Reflection and Prospect of the Study on the Mirror's Inscription of Han Dynasty

Shi Jiayi

**Abstract:** The collation and study of the mirror's inscription of Han Dynasty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Song to Qing Dynasty was the scattered collection period;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 the embryonic period. After the 1950s, it entered the period of professional collection and research. At present, the study of the mirror's inscription in Han Dynasty mainly focuses on language, literature,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 On the one hand,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methods of Han Dynasty mirror's inscription have been constantly expanded.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are more collations of local inscription, fewer integrated inscription collations, more philology studies, less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more research on ideological content, and less research on external issues related to production of text. In the future, the study of mirror's inscription of Han Dynasty should focus on "complete" and "refined", and the research methods should be diversified—the unearthed documents and the handed down documents are equally important, the fresh materials are brought by foreign documents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and the study of mirror's inscription of Han Dynasty will be further broadened by the interdisciplinary methods of philology and iconology.

**Key words:** the mirror inscription in the Han Dynasty; retrospection and reflection; study of "complete" and "refined" arrangement; comprehensive research.

[责任编辑/周舟]